

我国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研究

郭修金¹, 杨向军^{2,3}, 朱传耿⁴, 戴健³, 于善安⁵

(1.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产业与休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4; 2.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台州 317000;
3.上海体育大学, 上海 200438; 4.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发展与规划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14;
5.上海电力大学 体育学院, 上海 200090)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实地调查等方法, 对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内在逻辑进行解构, 厘清影响合理配置的现实困境, 继而回答如何进行合理配置。研究认为,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还面临供给主体单一、承接基础薄弱、供给结构失衡及协同融合不足等现实难题, 造成乡村体育发展短板明显, 制约构建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此, 推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 亟需坚持城乡资源要素优势互补, 推动城市优势的人才、组织、资金、科技、设施、赛事等资源要素在乡村地区形成良性汇聚之局, 亦需发挥乡村体育文化的优势, 促成城乡体育文化互哺发展之势, 从而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关键词: 城乡体育; 全民健身;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体育资源;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3-0048-11

The research on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ful elements for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ports in China

GUO Xiujin¹, YANG Xiangjun^{2,3}, ZHU Chuangeng⁴, DAI Jian³, YU Shan'an⁵

(1.School of Sports Industry and Leisure,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2.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7000, China; 3.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4.Sports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cademy,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5.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resource elements, clears out its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allocate rationall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hold that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resource elements still faces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single supply subject, weak undertaking foundation, unbalanced supply 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generates the obvious deficiencies for urban and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restric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adhere to the complement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 element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benign convergence of talents, organizations, fun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ilities, events and other resource elements with urban advantages in rural area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resource elements, and which is also necessary to take advantages of rural sports culture, promote the mutual feeding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culture for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suitable,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sports;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system; sports resources; rural revit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3-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研究”(20BTY080)。

作者简介: 郭修金(1972-), 男,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运动与社会发展。E-mail: zxyxj16@163.com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此,要破除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推进更多资源要素流向乡村,在乡村地区形成良性汇聚,以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体育融合发展,需要放置在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中考量,实现城乡体育共荣之局。目前学界关于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与城乡体育融合互动关系研究、城乡体育要素互补机制研究、城乡体育融合发展路径探究等方面。对上述研究梳理发现,现有研究鲜有涉及城乡体育融合发展中资源要素配置的具体内容及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基于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逻辑及实现路径,对推动更多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在乡村地区形成良性汇聚,构建更高水平的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逻辑

1.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内容逻辑

在城乡体育融合发展阶段,推动乡村体育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需推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实现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合理配置。为此,理应率先回

答何为城乡体育融合发展资源要素的配置内容?体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厘定城乡体育融合发展资源要素的配置内容,既需要从城乡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要素交融中汲取营养,又需要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六边工程”中显现体育要素的个性特征。为此,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体育比赛等资源要素初步纳入城乡体育要素资源的配置内容。

“十四五”时期,我国步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阶段。城乡体育要素资源配置内容的合理性,还需要验证纳入的资源要素能否真正推动乡村体育人才、组织、文化、产业及生态振兴。首先,实现城乡体育人才及体育组织要素的合理配置,将有助于直接推动乡村实现体育人才及体育组织振兴。其次,体育人才及体育组织是振兴主体,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生态是振兴客体,振兴主体的目的是为振兴客体^[1]。为此,结合乡村体育人才和体育组织振兴,通过合理配置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及体育比赛等资源要素,有助于充分发挥乡村体育所蕴含的经济、文化及生态效能,推动乡村体育实现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及生态振兴(见图1)。故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及体育比赛等成为城乡体育要素资源的主要配置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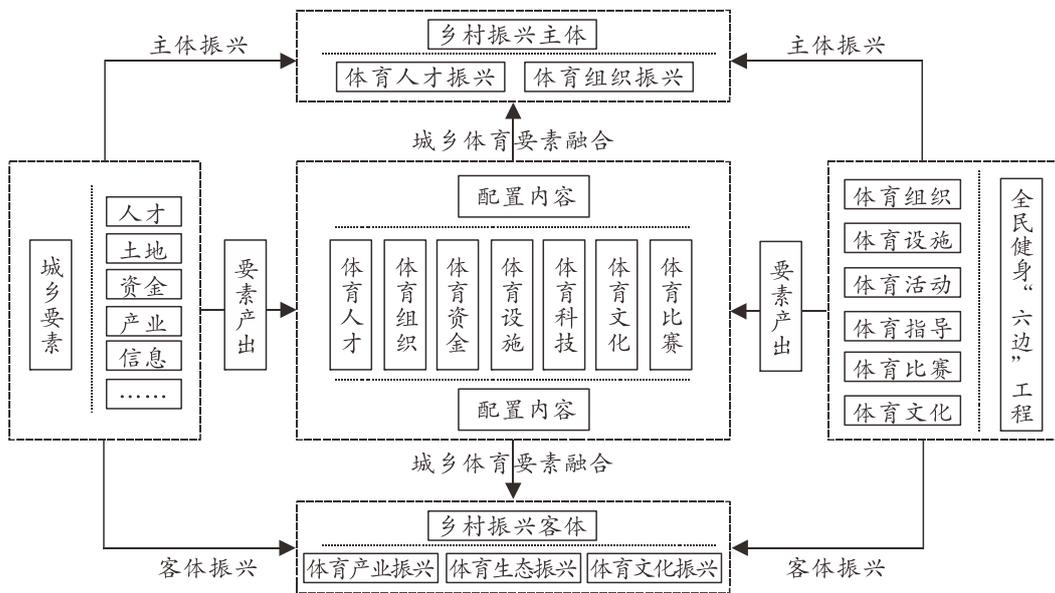


图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元素内容

1.2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结构逻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

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引导城市优势体育资源要素反哺乡村提供政策支撑。此外,推动城乡体育要素实现合理配置,亦需发挥乡村体育文化在塑造中华体育文化自信的优势力量,推动城乡体育文化互补,

加快推进城乡体育实现共同发展。

1)城乡体育人才要素：核心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肯定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显现人的主体性力量^[9]。可见，人的要素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而人才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禀赋性资源，更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梳理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城乡人才要素流动的政策支持轨迹发现：城乡人才要素流动的特征，在运动空间层面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农村单向流入城市”转向“推动城市人才下乡的双向互通”；在乡村人口构成主体层面经历“由农民单一主体”转向“城乡居民的融合主体”；在动力驱动层面呈现“由城镇化的单轮驱动”转向“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的双轮驱动”。为此，我国城乡人才要素的政策走向致力于推动城市优势人才要素反哺乡村。体育人才作为城乡人才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在城市反哺乡村的体育要素中立足于核心基础地位。

2)城乡体育资金要素：发展根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具有物的属性，属于生产资料范畴，决定体育资金是城乡体育生产活动的必备物质条件。在城乡体育二元发展阶段，我国城乡体育资金要素投入的流动态势呈现“重城镇，轻乡村”局面。当时某地86%城市社区都有相对固定的体育经费，而78%行政村没有体育专项经费，彼时城乡体育发展严重不均衡^[9]。体育资金作为支撑城乡体育发展的根本，是城市体育的优势资源要素，在城乡体育要素资源配置中理应推动城市体育资金反哺乡村体育发展。2015—2022年我国中央本级体育用于竞技体育的支出预算，除2018—2020年用于参加东京奥运会、冬奥会及世锦赛外，整体已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补助资金预算却增长势头迅猛，到2022年已增长至154.9亿元(统计结果依据财政部公布2015—2022年中央财政预算资料)。中央财政投入作为政府财政的走向，说明我国体育财政已经开启城市反哺乡村体育的历史进程。

3)城乡体育设施要素：重要支撑。

体育设施作为城乡体育活动实践必备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着城乡体育运动良性运行，决定体育设施已经成为城乡体育发展的重要物质支撑。2018—2022年全国乡村人均体育面积(0.79、1.00、1.15、1.36、1.57平方米)均低于全国人均体育场面积(1.86、2.08、2.20、2.41、2.62平方米)，说明体育设施要素是城市体育的优势资源，亦需推动城市体育设施要素资源反哺乡村体育。此外，2018—2022年全国乡村人均体育面积已

呈现增长态势，说明我国城市体育设施要素已经开启反哺乡村体育的发展进程。

4)城乡体育组织要素：发展保障。

体育组织是体育人才的延伸，能够凝聚体育人才群智之功，且具备着明确的组织目标和组织章程，在城乡体育活动开展中处于发展保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速社会组织的政社分离与管办分离”，我国体育行政组织角色开始转向扮演“管体育”之责，而体育社会组织角色重新演绎为“办体育”之职，提升体育组织的专业化能力。其中，2013—2018年我国法人登记体育社会组织规模从2.82万个增长至5.37万个，年均增幅超过10%^[4]。但体育社会组织一直存在下乡难题，导致城乡社会体育组织在数量及活跃程度均呈现云泥之别。为此，体育组织作为城市具有绝对优势的体育资源，需在城乡体育要素合理配置中加快开启城市体育组织反哺乡村的推进进程。

5)城乡体育科技要素：重要引擎。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城乡分离，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城乡分离必然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障碍。当生产力再次提升，突破“城乡对立”发展时，城乡关系将逐渐走向城乡融合^[5]。可见，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揭示社会进步是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此外，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由科学技术的推进水平所决定的，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类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结果。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带来城乡社会关系面貌的改变，推动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而“城市本身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6]，决定科技和城市形成天然契合体。在体育领域，体育科技要素属于生产力范畴，而城乡体育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体育科技的全面及根本性变革推动城乡体育关系由混沌转向对立分离，再逐步步入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为此，体育科技要素作为城市先天的优势要素资源，是推动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需加快推进城市体育科技要素反哺乡村体育的传播进程。

6)城乡体育文化要素：发展载体。

社会学认为文化是与自然现象所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成果^{[7][6]}。乡村传承着国家、民族及地域的优秀文化^[8]。梳理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政策支持轨迹发现：乡村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实现由保护、开发转向传承深化；发展载体由历史村落的实体保护和开发转向乡村文化产业及活动发展延

展;传承主体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延伸。在体育领域,乡村具备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责,正是城市体育所或缺的。乡村体育的文化优势正逐渐被世人所认知,推动乡村体育产业、体育活动实践等逐渐成为城乡居民品读乡土人文生态,体验自然四季更替的运动文化休闲之旅,在城乡体育要素资源配置中应与城市体育文化呈现互促之势。

7)城乡体育比赛要素:重要抓手。

现代体育源于城市的工业文明,体育赛事资源无疑为城市禀赋体育资源。从农民层面,推动现代体育赛事下乡,发挥现代体育赛事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优势,更容易为体育赛事参与群体带来无限的成就感,让农民享受现代体育乐趣,领悟现代体育的价值,满足当代农民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加速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化进程。如2022年贵州省“村BA”带动台盘村农民的返乡创业热潮,推动台盘村成为以篮球为特色的乡村人才及产业振兴的发展沃土^[9]。从市民层面,推动现代体育赛事下乡,将体育赛事与乡村的山水湖田林草沙及历史文化相结合,是满足城市居民“乡愁”需求的重要抓手。如2020年泰顺县雅阳镇马头山举办的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吸引城市专业参赛选手百余名且60万人通过杭州网在线观看视频直播,“有挑战性且有趣”成为赛事参与者的集体体验^[10]。为此,在城乡体育要素资源配置中以体育赛事作为重要抓手,应持续推动城市体育赛事反哺乡村。

2 我国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面临的困境

为了解我国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配置现状,2021年8月—2022年3月在全国进行分段抽样调查: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将总体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4个研究层域,其中东部地区选取广东、浙江、江苏3省,中部地区选取安徽、河南、湖南3省,西部地区选取重庆、陕西、贵州3省市、东北地区选取黑龙江省。发放两类问卷,且问卷皆经过专家效度检验及重测信度检验。其中,一类问卷面向乡村体育管理者,发放280份,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235份,有效回收率为83.9%;另一类问卷对象为乡村居民,发放4800份,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3595份,有效回收率为74.9%。

2.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供给主体单一

多元化的治理组织主体才能真正推动乡村体育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调研发现:在乡村体育设施的供给组织中,除“乡村社会捐赠”17.1%及“县城社会

捐赠”7.9%之外,其余皆为政府供给,说明乡村体育设施的最大供给主体为政府,甚至在一些乡村地区形成“垄断式”供给。此外,通过对县(区)体育部门供给乡村体育设施种类调研发现:东部地区集中供给篮球架、乒乓球台和一代健身路径,中部地区主要供给篮球架、乒乓球台和单双杠,西部地区则主要为篮球架、乒乓球台和单双杠,东北地区为篮球架、广场舞音响和单双杠,可见不同地区政府的体育设施供给并不存在太大差别。同样,调研县(区)体育部门向乡村输送的11项体育赛事,除排球、舞蹈、足球等比赛存在地区差别较大之外,综合性运动会,篮球、羽毛球、网球、门球、游泳、登山或跑步等比赛均无地区间差别。可见,政府作为乡村体育的单一供给主体,极易形成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同质化现象,很难满足村民多元化的个性体育需求。

乡村“体育+”新业态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产业,极易吸引城乡体育人才、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组织等体育资源要素的聚集。调研发现:乡村“体育+”新业态开发主体为乡镇政府的49.9%、县级政府的40.69%;乡村“体育+”新业态的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拨款的43.0%,加上7.2%的“政府发放债券”,两项政府资金来源占比高达50.2%。通过对乡村体育管理者的进一步访谈,发现活跃在乡村“体育+”新业态的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城投集团或者景区管委会等。可见,当下乡村“体育+”新业态的开发亦存在政府供给主体单一的情况,极易形成乡村体育资源开发和环境监管的“运动员和裁判”合体的现象,导致城乡“体育+”融合绿色发展的监管机制存在极大弊端。

2.2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承接基础薄弱

城乡体育要素融合承接基础薄弱最显著的特征是乡村体育人口基础十分薄弱,很难承接体育设施、体育比赛、体育产业等体育要素在乡村形成良性汇聚。调研发现:在乡村居民的体育运动频次上,选择“不固定,偶尔参加”为38.2%。在体育运动时长上,选择“少于30分钟”为22%,再加上20.4%“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说明乡村体育人口依然不足,对承接城市体育要素下乡存在发展短板。此外,在接受体育培训方面,选择“从不参加体育培训”的20.5%,加上20.4%“从不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信息获取渠道层面,虽然乡村居民选择使用手机和电脑获取体育信息之和为84.9%,但是乡村人口的现实情况是老龄化极其严重,50周岁及以上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为90.19%^[11],更何谈使用电脑网络,说明乡村居民通过现有的体育培训及体育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乡村居民的体育人口素养亦不理想,很难为城市体育要素下乡提

供有力支撑。还有,在乡村居民前往县城参与体育活动中,选择“从不参加”为 40.2%,再加上“从不参加体育运动”的 20.4%,说明超过 60%的乡村居民还处于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低层次水平,直接制约承接城市体育要素下乡的实际成效。

2.3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发展结构失衡

在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及体育比赛等资源要素中,体育设施优先得到配置,而其他要素往往处于末端,极易造成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发展结构失衡,不利于构建高水平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乡村体育处于优先扶持发展地位,带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大幅流入乡村地区。据 2018—2022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村委会体育场地总面积为 4.31 亿平方米,到 2022 年增长到 7.71 亿平方米。可见,乡村体育场地总面积持续增长,体育设施资源要素的配置力度极大。但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指导、体育资金、体育文化挖掘和保护等还存在极大欠缺:“外聘体育专家指导编制‘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和“乡村体育工作征求本地在外体育专业人才意见”,选择“没有”的分别高达 87.69%及 62.2%;县(区)体育部门指导的体育培训下乡次数,选择“1~3 次/年”的 22.6%，“0 次/年”为 18.3%;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选择“没有开展”高达 54.2%，“不知道”的 34.4%;乡村体育比赛的县城资金来源,选择“没有”4.9%,但选择“不知道”的 37.0%及“其他”的 9.6%;县(区)体育部门指导的体育文化工作,选择“没有开展体育文化宣传”的 16.6%,选择“没有开展乡村传统体育文化挖掘和保护”的 17.4%。

2.4 城乡体育要素配置的协同融合欠缺

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内部,作为客体的体育资金、体育设施、体育文化、体育科技、体育比赛等资源要素极易产生协同融合发展。诸如 2022 年贵州省“村 BA”篮球赛事采用线上网络传播,甚至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实现体育比赛和体育科技要素协同融合,亦丰富体育文化要素传播的渠道。但通过调研:乡村居民关于城乡体育健身电子地图建设,选择“不知道”高达 54.1%，“没有”的 20.4%，“有,查询不方便”的 12.7%;县(区)体育部门向乡村供给体育设施类别主要为篮球架 67.7%、乒乓球桌 58.7%及单双杠 45.1%,而诸如二代健身路径、智能健身仓等科技赋能的智能体育设施分别仅占 19.1%、7.2%。可见,城乡体育设施与体育科技的协同融合还存在极大欠缺。

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内部,推动客体和主体要

素的协同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调研发现:乡村居民更倾向于通过“手机网络平台”接受体育培训,而选择线下的“县体育局培训”仅为 8.9%，“线下培训”占县(区)体育部门供给的 56.2%,与体育科技相结合“线上培训(可回放)”仅为 29.4%。可见县(区)体育部门向乡村供给体育培训与体育科技资源要素的协同融合亦存在极大不足,从而制约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成效。

3 我国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路径

3.1 依托双轮驱动,推动人才互融

社会流动理论指出在提供平等流动机会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所带来的分层地位差异不仅不足为害,反而能够更有效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系统功能的持续提升^{[7]300-302}。为此,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双轮驱动下,体育人才平等流动机会浮现带动城乡体育人才基本实现双向自由流动及乡村体育人才的进一步聚集,从而形成人才流动的分层地位的差异性激励,推动城乡体育人才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的结果为“高素质农民群体”“乡村体育治理人才”及“乡村体育创新创业人才”(见第 53 页图 2)。

1) 凝聚乡土人才, 构筑融合主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人才振兴是关键,高素质农民是重要支撑^[12]。2019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同年 10 月,《2019 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指出高素质农民群体为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产业扶贫带头人、农业实用人才带头人、农业创新创业带头人及乡村振兴带头人,在乡村地区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且“拥有健康的生活理念,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被纳入高素质农民“有文化”的内涵^[13]。可见,高素质农民作为乡村地区具备广泛示范效应的体育人才,被党和国家赋予“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活动”之责。此外,《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科学技术健身、体育指导管理、乡村体育、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治理等内容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截至 2021 年 4 月,全国高素质农民群体已超过 1 700 万人,且“十四五”时期国家还将通过培训再增加高素质农民 500 万人^[14],对夯实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人才支撑意义重大。

2) 拓展治理人才, 把控融合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为此,

实现城乡体育治理人才合理配置, 需持续推动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政策性乡村体育治理人才下乡。此外,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5]。乡村善治治理理念的提出, 为

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志愿者、体育新乡贤等社会性体育人才流入乡村提供有力支撑。可见, 进一步疏通政策性及社会性乡村体育治理人才下乡的通道, 从而为构建乡村体育治理新格局提供新的发展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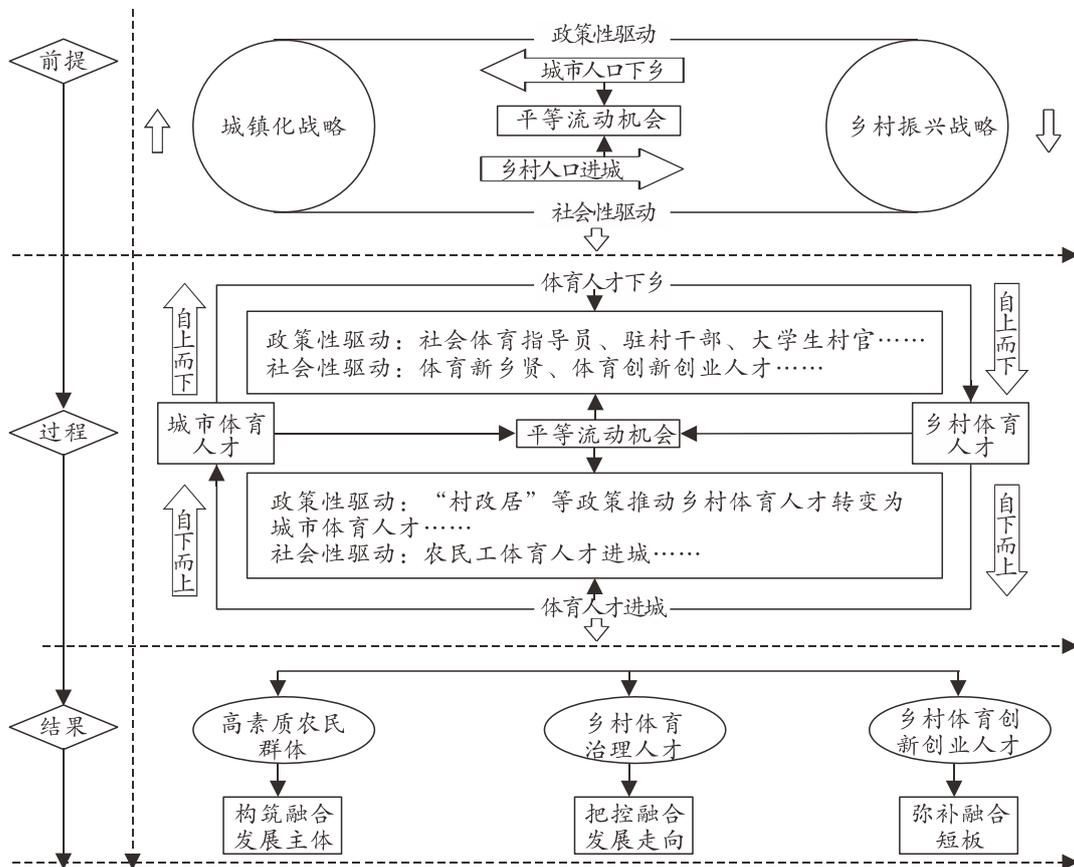


图2 依托双轮驱动的城乡体育人才资源要素合理配置

3)吸引双创人才, 弥补融合短板。

乡村创新创业人才是以返乡创业人才为主要主体, 是现代信息和多元资本的载体, 是科技兴农和智力下乡的践行者及城乡文化的融合者^[6]。《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2025年全国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将超3万亿元”。乡村体育乡村因其具备无与伦比的自然优势, 成为孕育户外运动产业的优良母体, 促使乡村户外运动产业将成为未来体育产业的新增长点。但现阶段, 传统农民在视野、资本等方面的局限不可能承接乡村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而乡村体育创新创业人才作为体育资本、视野、才智等多种优势资源加持的体育人才, 更容易知晓体育市场的变化, 在市场驱动下必将吸引城市体育人才下乡, 从而弥补城乡融合发展的人才短板。

3.2 重塑政府角色, 构筑多元投入

政府越位理论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一

种非理性政府行为, 往往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超出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 对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起着阻碍作用^[7]。政府越位理论亦可以延伸到公共服务领域, 指导乡村公共体育服务摆脱政府“垄断式”资金供给, 拓展多元资金的供给渠道。

1)政府财政投入, 筑牢融合基础。

首先, 政府财政投入为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提供根本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为政府财政投入优先支持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提供法律支撑。体育作为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将追随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步伐, 实现政府体育财政优先用于支持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

其次, 政府财政投入为乡村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提供必要扶持。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为满足公民更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自发供给不足的公共体育服务,政府通过给予一定的支持政策增加普惠性服务供给,实现大多数公民以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18]。《“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提出“政府将加大投入,促使城乡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与体育设施的衔接”。

最后,政府财政投入为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提供重要引导。随着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得到认可,乡村体育产业中乡村“体育+”新业态,逐渐成为推动我国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发展的新动能。现阶段,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理应通过体育产业专项引导金的政策引导手段。例如2014—2020年,浙江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已投入5.5亿元并带动812个项目获得市场投资,累计已达227.1亿元^[19]。

2) 社会资金参与, 补齐融合短板。

随着政府体育财政对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持续投入,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面貌得到极大改善。但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很难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治理体系”,带动新乡贤队伍参与乡村体育治理提供政策支持。在乡村体育健身市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体育新乡贤的资金捐赠已然成为弥补政府体育财政失灵的有力支撑,极大地弥补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社会资金短板。

3) 市场资金投资, 助推产业融合。

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属于满足城乡居民高层次、个性化的体育需求,决定供给主体是市场,而政府处于引导和监管角色。《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指出“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将达到5万亿元”,其中乡村体育服务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新增长点,后发优势明显,必将吸引大量市场体育资金从城市体育产业中转移出来,追求乡村体育服务业的乡愁和休闲经济的发展红利。其中,乡村体育旅游服务业发展势头显著,2020年“体育+旅游”在中国乡村旅游主要内容占比已高达15%^[20]。

3.3 推动城乡一体, 夯实设施支撑

1) 增强城市回哺, 促进城乡共荣。

弗朗索瓦·佩鲁“增长极理论”是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典范之作,指出国家要实现最终的均衡发展,城市就可以作为国家的金融、贸易发展和服务中心,吸引农村要素流向城市,在城市规模得到发展后形成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21]。依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将“增长极理论”迁移至诠释处于城乡非均衡发展态势的城乡体育设施建设同样存在适用。

毕竟我国城市体育能够取得率先发展,主要是依托乡村体育的鼎力支持。在城市体育达成一定规模发展后,城市体育理应回哺乡村体育,必然带动体育设施由城市地区率先向乡镇地区延伸,最后覆盖全部乡村地区。因此,城市体育设施要素回哺乡村体育的同时,夯实乡村体育实现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从而助推城乡体育最终实现共荣。

2) 规划空间布局, 推进城乡共建。

1984年我国著名学者陆大道在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点轴理论。依据点轴理论,以县域作为点轴分析整体,“中心节点”指县城,“次中心点”为乡镇政府驻地,“非中心节点”为行政村;“主轴”指由县域重要的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主要通道,犹如人体的大动脉;“次轴”指由行政村连接乡镇的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主要通道,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22]。依据“点轴理论”合理谋划城乡体育设施的地理空间一体化布局,推动城乡体育设施实现共建,为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

随着我国村村通工程的全面贯通,在公路交通线上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农村公路交通网络^[23]。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网中,我国城乡信息网络线已实现城乡一体化贯通。为此,将县域内各个健身设施为“中心点”,将县域内的交通线、信息网视为“轴”,通过交通线、信息网等组成的线下和线上的“轴”,形成城乡体育设施的“点”和“轴”一体化链接,轴线上集中的体育设施通过信息、人员等渠道,对附近区域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具备扩散作用。

3) 强化标准建设, 助推城乡共享。

十九大报告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写入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为此,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应从全民共享及全面共享着手,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及幸福感。同样,我国城乡体育设施标准化建设进程中,推动城乡体育设施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及全面共享,是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目标追求。

目前我国城乡体育设施标准化进程得到国家政策的持续关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体育总局 财政部关于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通知》及《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等皆明确规定公共体育设施的服务对象为城乡居民;2021年4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将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纳入国家公共服务标准化

建设内容; 2022 年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印发《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再次重申公共体育设施是面向城乡居民开放, 并明确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的具体细则。

3.4 凝聚组织功能, 提升专业水准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 其中包括社会的分化。社会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承担多重功能的单一组织向承担单一功能的多重组织转化, 社会组织逐渐呈现高度

专门化、功能单一^{[7]317-318}。此外, 哈佛大学雷格斯运用生态学理论, 采用结构功能理论和物理光谱理论, 将光的折射过程, 形象地解释社会治理主体职能专业化的发展走向^[24]。为此, 在现代社会的公共体育服务领域, 政府组织在参与城乡体育社会治理过程, 应转变以往乡村体育单一供给的角色, 主动放权给与体育社会组织、市场中的企业组织以及城乡自治组织, 提升上述组织参与城乡体育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从而推动体育社会组织下乡、企业组织市场下沉及城乡自治组织蓬勃兴起(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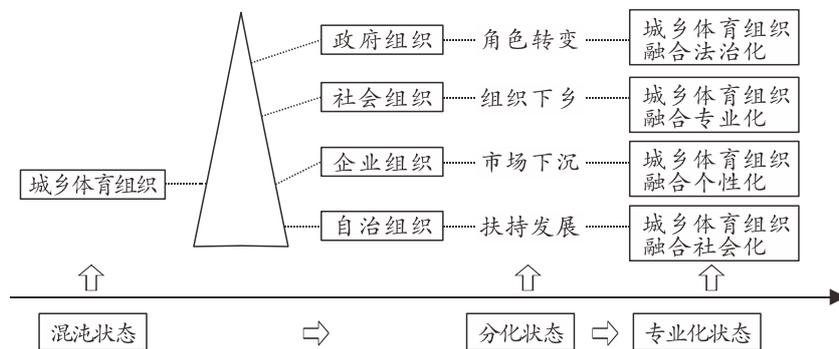


图3 城乡体育组织合理配置

1) 法治政府建设, 推动融合法治化。

洛克有限政府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治理必须依靠正式公布和长期有效的法律^[25], 奠定法治政府的理论基础。法治政府建设的目的在于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26]。自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列^[27]。在体育领域, 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应加快由乡村体育“管办合体”的“垄断”状态转向依法行政的“管理体育”角色转变, 持续升华体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 激活体育社会组织及体育企业组织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修炼好乡村管理体育的内功, 落实体育行政许可清单管理和部门权责清单, 提高体育政策的社会风险评估能力, 从而真正推动政府扮演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引导者、服务者及监督者角色。

2) 治理主体下乡, 赋予融合多元化。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并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开端, 推动体育行政组织、体育企业组织及体育社会组织实现多元化发展。首先, 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下, 乡村体育社会组织严重缺乏, 亟需打破体育社会组织的下乡门槛, 提升老年体育协会、

农民体育协会及其他单项体育协会下乡发展会员单位的积极性, 最大限度发挥体育协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其次, 企业创新的内涵亦是市场营销的内涵, 即满足需要和创造市场^[28]。《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提出“2025 年全国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将超 3 万亿元”。乡村因其具备无与伦比的自然优势, 成为孕育户外运动产业的优良母体。乡村户外运动庞大的市场体育体量需求, 亟需引导城市体育企业发挥自我才智, 开发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需求的乡村户外运动产品, 从而深化城乡体育市场组织融合的个性化水平。

3) 自治组织兴起, 深化融合社会化。

体育是人民的事业,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调动人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29]。我国乡村体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观, 需体现以农民为主体, 扶持及培育农民体育自治组织蓬勃兴旺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活跃在城乡基层社区未登记的草根体育社会组织数量超过百万, 网络体育组织超过 80 万, 并且草根体育组织数量仍呈快速发展之势^[30]。此外, 随着交通网、信息网及环境承载力的全面提高, 村民体育自治组织进城、市民体育自治组织下乡已成为常态化的城乡体育生活方式互动, 带动城乡体育自治组织广泛性的社会交流, 深化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社会化水平。

3.5 借助科技引擎, 助推城乡共融

当前正处于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突出特征的信息革命, 且我国已经由信息革命开局发展阶段的跟踪式者向并行者, 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为此,

体育将跟随信息革命的发展浪潮, 带动体育场景迁移到线上、打破现实社会中城乡体育的从属地位之争及推动城乡体育智能产品的普及(见图 4), 从而促使体育科技成为推动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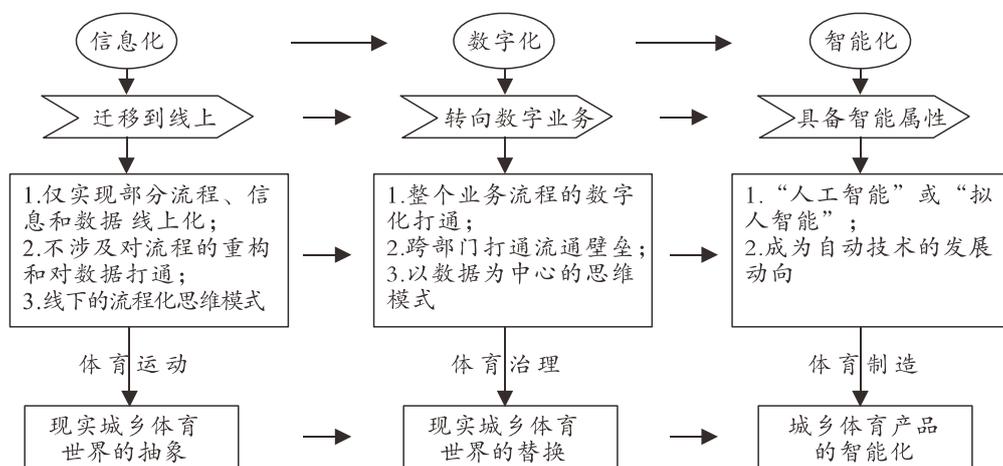


图 4 城乡体育科技合理配置

1) 信息融入运动, 拓展体育生活网络化。

信息化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 对所研究对象各要素汇总至数据库, 供特定人群生活、工作、学习、辅助决策等和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为相结合的一种技术^[31]。信息化科技融入体育运动, 推动现实城乡体育锻炼的物理空间移入为线上抽象的虚拟体育锻炼新居室, 实质是现实体育世界的抽象反映, 极大地拓展城乡体育生产生活空间。例如 2022 年 4 月 28 日,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众部联合推出“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为居家隔离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足不出户开展科学健身的机会。可见, 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在信息化科技的支持下, 推动体育运动由线下体育指导转移到线上体育健身, 是全面拓展城乡体育生产生活新空间的典范之作。

2) 数字嵌入治理, 助推体育治理现代化。

数字化是指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 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模型^[31]。数字技术颠覆性地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是现实世界的替换。在我国, 数字化科技嵌入城乡体育社会治理, 摆脱信息化依赖人工数据输入的弊端, 借助电子计算机的“机器学习”过程, 进行城乡体育社会治理的业务指导。因此, 数字化科技为城乡体育社会治理, 建立数字化城乡体育业务处理流程, 打通跨部门处理城乡体育社会治理业务的阻碍, 树立数据化的城乡体育社会治理思维, 助推城乡体育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3) 智能拥抱制造, 推动体育健身科学化。

智能化是指事物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 所表现的能够满足人各种需求的属性^[31]。鉴于智能化科技的人工智能或拟人智能属性, 与体育设施或体育装备等产品实现相拥, 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体育产品使用终端的智能化水平, 增强乡村地区科学健身的实际效能。譬如, 随着乡村科学健身理念的持续推动及乡村电商的兴起, 已经带动智能手表或手环等智慧体育穿戴设备进入乡村地区。例如, 2016 年全国智能手表销售额仅 86 亿元, 到 2021 年增长至约 318 亿元, 同比上升 16.9%, 年均复合增速为 29.9%, 预计 2025 年超过 400 亿元^[32]。

3.6 依托载体培育, 推动文化互哺

1) 培育产业载体, 助推城乡共荣。

乡村体育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为自然资源禀赋。为此, 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体育文化产业, 有助于促进乡村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和环境链有机统一, 能最大化释放出乡村体育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33]。《“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利用不同区域自然生态禀赋, 引导户外运动产业合理布局, 打造区域特色户外运动产业”。为此, 乡村因地制宜地开展以山水湖田林草沙等自然资源为空间载体的产业融合, 推动体育与农业、康养、休闲、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承接城乡居民的体育运动与健康休闲需求, 有助于孕育

出独特的乡村体育文化产业风貌。此外,体育特色小镇亦是体育健身文化及乡村特色自然文化风貌的融合体,在深度还原乡村的生产、生活及生态文化的同时,推进城乡体育文化产业的共兴共荣。

2) 现乡愁载体,致力城乡共生。

乡村与城市相较,在社会结构、生活习性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云泥之别。乡愁是游子对故土的依恋,乡愁记忆中驻足着四季更替与袅袅炊烟等乡村场景。为此,守住乡愁,繁荣乡村文化,建设乡土文化认同的美丽乡村,才能真正有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此,通过在乡村地区举办体育赛事,吸引城乡居民深度参与,形成体育集体记忆,定格体育乡愁,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深度向往和价值认同。此外,我国乡村地区蕴含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具备特定区域的文化符号及身份象征,且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为此,借助现代化的手段挖掘和保护乡村传统体育文化,推动体育历史情景再现,凝聚传统体育文化的家国情怀内核,铸造体育美丽乡愁的新载体,从而有助于推动城乡体育文化共生。

3) 推进治理载体,构筑城乡共建。

传统乡村是由血缘、地缘及业缘组成的熟人社会。虽然经历城镇化的侵蚀,导致乡村持续人口外流,业缘关系发生极大的变迁,但血缘和地缘已然成为乡村人口的根系所在,在乡村熟人社会结构中依然举足轻重。乡村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注重礼治秩序,且村规民约承载的文明礼仪内容依然成为乡村居民锤炼“私人道德”的行动标准,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的价值认同。因此,推动城市体育活动或赛事下乡,一方面可以展示体育活动或赛事中的团结互助、敢于拼搏的文化精髓,可以为乡村居民提供道德滋养;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乡村传统体育赛事或活动所演绎的家国情怀,亦可以成为弘扬和传播乡规民约的教化讲堂,从而推动乡村文明社会的城乡共建。

3.7 发挥辐射带动,共创赛事融合

美国地理学家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中提出“核心边缘理论”,用于解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系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理论,即核心区得到发展,然后形成区域辐射,从而带动边缘区的发展^[34]。为此,依照“核心边缘理论”,将城市体育赛事作为核心区,形成对乡村地区体育赛事的区域辐射带动效应。

1) 畅通城乡渠道,推动赛事下沉。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体育设施大为改观,为城市体育赛事的下乡夯实物质基础。其中,2020年全国行政村已经实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且在“十四五”发展时期还将持续“加快补齐5000

个以上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的原则,为城市体育赛事下乡提供法律支撑。此外,体育赛事还具备极强的经济效能,可以和乡村休闲农业、乡村文化、乡村旅游、乡村民宿、乡村餐饮等相关产业实现产生良性融合,从而为城市体育赛事下乡提供内在驱动引擎。

2) 凝结多方聚力,推动城乡共创。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贴近自然的户外运动需求越发强烈,推动飞盘、陆冲、滑雪、露营等户外运动项目成为人们休闲新选择^[35]。乡村体育赛事融入乡村环境与民众追求的户外运动具备天然契合优势,极易成为城乡居民追求户外运动的休闲出口。但乡村地区举办体育比赛的能力及参赛人员均存在不足之处,亟需发挥城市在举办体育赛事的组织、资金、人才等优势辐射效应,引导城市体育优势办赛资源下沉,推动城乡体育赛事协同共创;亦需推动城市各类体育参赛人员下沉,激发户外运动休闲需求,从而辐射带动乡村居民深度参与乡村体育赛事,从而实现乡村体育赛事城乡共享之局。

3) 创新传承,融入农趣农味。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优势逐渐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为此,举办乡村体育赛事,应依托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内涵,并借助现代体育科技创新传承模式和手段,推动城乡体育赛事文化互哺,从而将乡村体育赛事塑造成农民所熟知的生活场景,赋予乡村体育赛事典型的地方性农趣农味,以推动乡村体育赛事在乡村体育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重新绘写乡村体育赛事的独特之姿。例如2022年9月“中国农民丰收节”,在福建省龙岩市柚子化身各类运动道具,柚子接力赛、竹子赶柚、柚子保龄球、柚子套圈大作战等活动,吸引众多群众参与^[36]。

参考文献:

- [1] 陈锡文. 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EB/OL]. (2022-11-30)[2023-04-16]. https://theory.gmw.cn/2022-11/30/content_36200060.htm
- [2] 陆扬, 陆树程. 改造世界的主体性及其限度[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10-15(A08).
- [3] 马进, 田雨普. 和谐社会构建中城乡群众体育统筹发展的思考[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6(6): 66-7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统计公报[EB/OL]. [2023-04-20]. <https://www.mca.gov.cn/n156/n189/index.html>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 [7]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8] 陈锡文.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加快乡村发展[EB/OL].(2023-04-01)[2023-04-16].<https://mp.weixin.qq.com/s/VwJWmtdUAFs2EpMD1BJmlQ>
- [9] 贵州:台盘村的乡村振兴新思路[EB/OL].(2022-11-22)[2023-03-20].<https://xczx.cctv.com/2022/11/22/ARTIj3qBe23lAbtnXnWap2sJ221122.shtml>
- [10] 2020浙江自行车联赛(第四站)“华东大峡谷杯”泰顺雅阳马头山山地越野赛完美收官[EB/OL].(2020-12-07)[2023-08-16].https://www.sohu.com/a/437089965_467513
- [11] 中国九成以上农村家庭拥有至少1部智能手[EB/OL].(2022-05-06)[2023-03-20].<https://t.yinet.cn/baijia/32726364.html>
- [1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2021-02-23)[2023-03-20].http://www.xinhuanet.com/2021-02/23/c_1127130383.htm.F5B7A8B2-699B-45A0-82A6-CC166CFFC07D
- [13]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1.
- [14] 杨文明,乔栋,银燕.全国1700万高素质农民活跃在乡村振兴一线[N].人民日报,2021-04-08(006).
-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35.
- [16] 雷洪,赵晓歌.“城归”现象:主体特征、形成机理与生成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4):58-62.
- [17] 胡金林,王长征.论转轨时期的市场缺失与政府越位[J].江汉论坛,1998(8):83-85.
- [18] 如何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发改委回应[EB/OL].(2022-01-12)[2023-03-20].<http://bj.cmtt.com/doc/1062/7/0/0/106270037.html>
- [19] 浙江省专项引导资金助推体育产业发展[EB/OL].(2020-03-10)[2023-03-20].<https://www.sport.gov.cn/n14471/n14482/n14519/c980622/content.html>
- [20] 2021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数量、旅游花费及发展趋势分析[EB/OL].(2021-11-23)[2023-03-20].<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111/986974.html>
- [21] PERROUX, FRANCOIS. A note on the notion of growth pole[J]. Applied economy, 1955(2): 307-320.
- [22] 薛秀青,白明刚,乔良,等.基于“点-轴”理论的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2,38(6):68-75.
- [23] 李俏,陈柳,赵向红.城乡融合视域下养老下乡的生成机制与实践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21(2):132-141.
- [24] 聂平平,尹利民.公共组织理论的历史演进[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3.
- [25] 叶启芳,翟菊农.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9:53.
- [26] 杨丽琼.钱颖一认为防止任意行政干预需建权力清单 法治造就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N].新民晚报,2014-08-29(B2).
- [27] 马怀德.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J].政法论坛,2020,38(6):12-13.
- [28] 许宁.企业创新的实质——满足需要,创造市场[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9(12):30-32.
- [29] 国家体育总局编写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 [30] 王凯.新时代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政府责任——基于元治理理论和体育改革实践的分析[J].体育科学,2019,39(1):12-19+34.
- [31]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你能分清吗?[EB/OL].(2023-04-16).<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706340>
- [32] 市场调研报告:预测在2025年中国智能手表市场规模超过400亿元[EB/OL].(2022-08-23)[2023-05-20].<https://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220823162226934523020>
- [33] 郭修金,代向伟,杨向军,等.尤传豹.乡村体育文化振兴的价值追求、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6):1-7+33.
- [34] FRIEDMANN J R.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64.
- [35] 张小可.户外运动持续升温 功能性服装受青睐[N].中国体育报,2022-11-18(002).
- [36] 丰收节,体育助力乡村焕发别样活力[EB/OL].(2022-09-23)[2023-04-16].http://sports.news.cn/c/2022-09/23/c_1129025596.htm
- [37] 陈学璞.体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魅力[N].广西日报,2021-03-23(008).